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周晓菲 电子邮箱:gmrbsjs@gmdaily.cn 光明日报

《乌托邦》:一个哲学的国度

□ 刘 城

托马斯·莫尔(约1478—1535年)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著作《乌托邦》于1516年12月在鲁汶印制第一版,次年在巴黎印制第二版。这部著作的成功,确立了莫尔作为人文主义著作家的地位,他也因此被称为"政治哲学家"。

"乌托邦"(Utopia)是莫尔创造的一个词语,意为"乌有之地"。《乌托邦》一书的全称"关于一个最好的国度,关于新发现的乌托邦岛屿",也表达了"乌托邦"作为"幸福与幸运之地"的寓意。莫尔将乌托邦的地理位置设定在"新世界"的一个岛屿,这是大航海行动衍生的概念。莫尔还塑造了一位大航海时代的传奇人物拉斐尔·希斯洛德——乌托邦的信息来源与讲述者。拉斐尔出生在大航海行动的发起之地葡萄牙,"为了前往遥远的国度增长见识,跟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三次航海远游",访问过乌托邦所在岛屿。虽然拉斐尔·希斯洛德是虚构的人物,《乌托邦》表达的思想却是莫尔的政治意向与治国理念的真实呈现。

广义的哲学理念与普遍的哲学教育

乌托邦是一个经历过民智开启的文明之地:征服阿布拉克萨岛并且将之更名为"乌托邦"的国王乌托帕斯,将岛上"粗暴、野蛮的居民改变成为具有良好教养、懂人文学术、待人彬彬有礼的优秀完美之人"。开启民智的手段是教育,把读书学习纳入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

乌托邦的教育分为全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普通民众接受普及型的知识教育,精英阶层接受研究型的学术教育,由此形成体力劳作者与智识精英两个社会等级。

智识精英经历过"选士养士"制度的筛选与修炼,是智力超群、学养深厚之人。一部分"专注力强、才智超群、天资适宜学术之人",在孩童时期被甄选出来,作为有潜力的智识精英施以学术教育。成年男女中的优秀者,经过荐举之后亦有机会增补进入智识精英的行列。乌托邦对智识精英在学术与道德方面有强制要求,未达到预期标准的候选人,淘汰之后退回到体力劳作者行列。在智识与道德方面始终表现优秀之人,"免除一切体力劳动,专注于学术",传承乌托邦的价值观与学术水准,并且承担起为公众服务的责任。

乌托邦人对传统学术存有浓厚兴趣,学习"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在这些领域的造诣几乎赶得上古代哲学家"。乌托邦人"对于星辰的轨迹、天体的运行极为熟悉。他们巧于设计各式仪器,用于精确地观测太阳和月亮,以及目力所及一切星象的运行与位置"。关于"潮涨潮落,大海的含盐量,天体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乌托邦人的某些观点与古代哲学家相同,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乌托邦人"收藏有普鲁塔克的作品,也欣赏琉善的快乐诙谐"。乌托邦人吟诵诗词歌赋,阿里斯多芬、荷马、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都保存有"阿尔都斯小字印刷文本"。乌托邦人阅读历史,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撰写的史学著作都存书在册。乌托邦人学习医学,希波克拉底、伽伦的著作都在他们的阅读范围之内。拉斐尔在第四次航海远行时,为乌托邦人带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植物学著作、赫利奥斯与斯科里德斯编写的辞典。

莫尔推崇古典希腊哲学,认为优秀的哲学思想存在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之中。对于希腊哲学的热爱,也传导给了《乌托邦》塑造的人物。拉斐尔并非仅仅是"帕利努鲁斯式的水手",还是《荷马史诗》中"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国王",是"哲学家柏拉图这位古代智慧的化身"。希腊语是学习古典哲学的必备语言,拉斐尔"虽然学会了拉丁语言,但是在希腊语言的造诣方面更加渊博精深……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的学习之中"。乌托邦人"轻而易举学会了希腊字母,词语发音清晰,背诵记忆迅速,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复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掌握了希腊语言,可以流畅地阅读名家作品"。莫尔并不否定罗马文明的价值,成就于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与诗人也得到了他的赞许。然而在莫尔心目中,希腊著述的重要性占据第一位,拉丁著述的重要性位列第二。

莫尔奉行广义的"哲学"理念,将一切学术都纳入"哲学"的范畴,不同学术之间只有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哲学之类的区分。依照莫尔的理念,乌托邦是一个哲学的国度,乌托邦的成员都是哲学家。乌托帕斯在"乌托邦"创建伊始将一个"没有哲学"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哲学之城"。哲学不仅用来提升乌托邦人的智识与道德水准,塑造正直善良的人格,而且提供治国之道。莫尔持有"哲学治国"的理念:如果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致力于哲学研习,"由此可以带来完美的幸福快乐"。

乌托邦价值体系的核心:理性

在乌托邦社会运行规则的纵深之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理性"的思想动力来自古典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是人工设计的社会,"接受什么、拒绝什么,都是遵循理性的尺度,理性极大地点燃了人们内心对于神的热爱与崇拜"。莫尔在哲学的理性之中加入了"从宗教中提取"的原则,堪称"哲学宗教"。"没有这些原则,……理性既软弱又不完善"。宗教原则的基本内容是"灵魂不死":如果在尘世生活中践行美德与善行,就可以在未来获得"用理性加以验证"的酬报。

私有财产作为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支撑,是乌托邦首先拒绝的因素。"在无岛之地创建了一个岛屿"的乌托帕斯国王,"极为厌恶世间的财富",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居家房屋"。乌托邦实行财产共有制度,一切物质与设施在居民中间按需分配。与私有财产一起拒绝的是门阀世族的社会地位,乌托邦不存在财富与门第的世袭继承。

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法律对于社会的规范作用微乎其微。在乌托邦,"一切物质由公共享有,每个人都获得充裕的生活所需"。"贤明并且以圣洁自律的乌托邦人,无须法律就可以使一切充足有序,唯有美德是无价之宝。"当法律的强制作用失去效力以后,人的行为依靠理性加以规范。乌托邦人的生活完美地诠释了莫尔的理念,相信美好的生活由理性主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友谊、和平之类的美德作为行动准则,人们之间互利互惠互爱,构建起密切和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管理者无须采取强制手段即可以使各类组织形成有机体。

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圈地"的批判

莫尔关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并非凭空设想,而是以现实的关怀为前提。《乌托邦》对圈地引发的社会弊端展开激烈批判:贪婪的土地所有者渴望从羊毛产业中获取超额收入,通过圈占土地而实现从粮食种植向牧羊业的转换,从而剥夺了农民的生计。"贵族、乡绅、圣洁的修道院长们,不再满足于一年一次的岁入,……也不再满足于无利可图的闲散生活"。他们"把土地全都圈占成为牧场,推倒房屋、拆毁村镇,除了用作羊圈的教堂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站立的建筑"。失去衣食来源的农民由此陷入赤贫状态,除却乞讨与盗窃之外别无生路。"你们的羊不再是温顺的小型食兽,……而是变成了大型的吞食者。它们是如此狂野,吃光吞尽种田人。它们消耗、摧毁、侵占成片的田地、房屋、村镇"。世代耕种土地的农民"被驱赶出熟悉的祖屋,难以找到歇息的地方,……只能以偷盗为生,却因此而被处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发生在英格兰的"圈地"界定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莫尔也因为《资本论》关于"羊吃人"言论的引用而成为资本原始积累最初的批判者。作为人文主义学者,莫尔的批判停留在悲天悯人的现象层面,并未达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高度。

面对圈地引发的流离失所人口,莫尔认为政府的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法庭以绞刑惩治偷盗者,"超越了法律的公正性,对共同体造成了伤害"。"如此恐怖的死刑惩治,难以阻止那些无以为食之人从事偷盗"。"如若拥有其他的谋生办法,没有人无奈之下铤而走险,先是偷盗然后赴死"。莫尔提出:应对圈地弊端的有效办法不是严刑峻法,而是根除私有财产制度。"只要私有财产制度存续,大多数人就难以避免陷入赤贫的悲惨境地"。正是在批判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之上,莫尔为乌托邦设计出"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产品"的经济制度,借此实现哲学治国的理想。然而莫尔关于共有经济只是提出了简单的设想,缺少系统的理论构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研究者回望历史,将莫尔的设想定义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以此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之一。

莫尔在《乌托邦》中表达的哲学治国理念,借鉴了柏拉图"公民教育的理性目标",更是16世纪时代的产物。大航海行动的探险精神,造就了新世界的乌托邦岛屿。文艺复兴的人文环境,促成了将广义的哲学理念用于社会运行的规划。资本原始积累引发的社会弊端,成就了以共有经济作为哲学国度物质基础的思考。莫尔以新时代的思想风貌尝试"托古改制",对于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有细致入微的描述,有巧妙的构图呈现,阅读者对此有亲临其境、眼见为实的感觉"。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

□ 孙卫国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因为汉字的使用构成东亚各族共同的文化基石,儒教促进精神文化的整合,佛教维系共同的宗教信仰,律令制度为东亚各国所共同实施的政治制度。其中,佛教是中国化的宗教,其余三者皆起源于中国,发展成熟之后,传到周边各国,经过长期的博弈,在唐代形成了以中国天下秩序为主导的古代东亚世界。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东亚各国尤其是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是透视中国古代文化东传的一个重要例证。

大量中国史籍东传

中国古代史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难以考证。不过,从传说的箕子朝鲜开始,朝鲜半岛就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结合其本国特色,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底色的文化特征。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作为官方使用的文字。汉四郡时期(公元前108—313年),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朝鲜三国时代(公元前37—668年),中国史书已被广泛阅读。《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北宋中期,宋王朝允许将《九经》、子、史诸书卖予高丽使者,宋朝史书源源不断流入高丽。朝鲜朝天使与燕行使来到中国,搜求中国史籍成为他们使行的重要任务。朝鲜王廷还想方设法请求明清王朝赐书。通过朝廷赐书与使行购求,中国许多史籍传入朝鲜半岛,成为人们学习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途径。其科举考试也效仿中国王朝,如新罗(公元前57—935年)科举取士,以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作为重要标准。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考试范围,促使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进而推动了中国史籍在朝鲜的传播。中国古代多部重要史书传到朝鲜半岛,并产生深远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成为朝鲜半岛修史效仿的对象。

古代朝鲜效仿中国建立官方修史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任命史官记录史事的国家。西周时期,修史已成为官方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得以发展,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均设有专门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从汉代开始,有设立史官编纂本朝历史的传统。唐代以后,由朝廷设立史馆,选任史官,修撰国史,成为定制。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王朝通常以为胜朝修史的方式来宣示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由朝廷主导的官方修史制度,对朝鲜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随着汉字的传入,以王朝为主导的中国史书编撰方式也传入朝鲜。朝鲜三国时代,撰写始祖神话、王室谱系、历代君王政绩等,成为史书主要内容。新罗和高句丽模仿中国修史制度,开始记录王朝大事,百济肖古王时期(166—214年在位)也开始编史记事。统一新罗(674—935年)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机构,崔致远、金大问、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编撰史书。高丽王朝(918—1392年)模仿唐、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设立春秋馆,实行监馆事制度,由宰相监修。史官虽名目繁多,品位不高,但职责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绩乃至王朝时政大事,及时记载,史官各负其责,分工协作,有效保证了官方史学的运作。与此同时,高丽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注制度和新继位王为已故国王撰写实录的制度,高丽王朝共修30多位国王的实录。在实录基础上,再修纪传体正史。

朝鲜王朝(1392—1910年)以程朱理学立国,史馆建制比高丽更加完备。李成桂立国之初,置艺文春秋馆,设史官记录国史。此后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置奉教、待教、校阅等品级较低的史官八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品级较高的修撰官、编修官、记注官等,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文书为基础,加上朝臣奏折、谏言、诸道资料等,撰成《时政记》。艺文、春秋馆在《时政记》基础上,再编成实录。现存《朝鲜王朝实录》非常完备,记录了自太祖到哲宗长达472年的事迹,共计1893卷,4840余万字。此外,朝鲜王朝官方也常常临时设馆、编修史书,如编修《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舆地胜览》等。

可见,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官方主导修史的特征,史官是朝中重要官员,官修史书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私家史学则处于从属地位。

中国史书体裁成为古代朝鲜修史的模板

如上所述,几乎每部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朝鲜,成为人们习读的重要史籍,也是朝鲜效仿的对象。流传下来的古代朝鲜史书几乎与中国史书体裁一致,古代朝鲜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也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如出一辙。

"春秋笔法""尊王攘夷"、为当朝塑造正统,中国官修史书的这些指导原则,也是朝鲜官修史书遵循不悖的准则;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基本体裁,也成为朝鲜史家编史依从的典范。高丽金富轼(1075—1151年)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1396—1478年)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朝鲜学人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林象德《老村集》卷3《东史会纲序》)"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另外,《三国史记》《高丽史》也直接征引《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这些中国史籍是不可或缺的史源。

朝鲜王朝出现大量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则是模仿《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的结果,如徐居正的《东国通鉴》仿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著。郑梦周曾曰:"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实录亦不详悉,请置编修官仿《通鉴纲目》修撰,以备省览。"(郑麟趾《高丽史》卷117《郑梦周传》)朝鲜王朝因而出现了大量仿朱熹的纲目体史书,诸如金宇颙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俞棨的《丽史提纲》、洪汝河的《东国通鉴提纲》、林象德的《东史会纲》、安鼎福的《东史纲目》等,都是重要的纲目体史书。上述提到的高丽与朝鲜王朝实录,也是仿效宋代实录而编成的。

因此,朝鲜半岛史书的编纂,无论是体裁还是内容,均与中国古代史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中朝史学交流和朝鲜古代史学史,可以深化对中国古代史学和中国历史的认识,拓展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下的古代晚期研究

□ 康 凯

自20世纪以来,公元4-8世纪地中海世界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经典课题。这一时期涉及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因此同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领域。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在"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框架下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例外。例如,佩里·安德森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将蛮族入侵看成是地中海世界转型的主要外因,农民们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沉重的税负让他们丝毫不关心蛮族的入侵,这是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因。

就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衰亡"研究范式被改写。当时年轻的牛津大学讲师彼得·布朗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提出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强调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文化中的活力和创新,反对"罗马帝国衰亡"的传统解释框架。"古代晚期"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显学"。许多学者追随布朗的研究路径,借助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文化史、艺术史和思想史成为古代晚期研究的主要领域,而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主题则一度受到冷落。

自21世纪初以来,贾留斯·巴纳吉和克里斯·维克汉姆这两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古代晚期研究的新视角与传统的研究主题结合起来,分别对地中海世界转型阶段的社会经济史进行考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巴纳吉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关于地中海世界转型研究的代表作有《古代晚期土地制度的变迁》和《探索古代晚期经济》。他对古代晚期的兴趣最初来自阅读圣克鲁瓦的《古希腊的阶级斗争》,但并不认同书中对罗马帝国晚期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状况的悲观主义描述。在他看来,圣克鲁瓦、琼斯以及之前的绝大部分研究者对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悲观态度,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在"衰亡范式"下对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经济状况的阐释。韦伯认为,公元3世纪以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开始了一段长期衰退的过程。当时的罗马帝国饱经战乱,劳动力短缺,货币贬值,民众税赋繁重。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土地所有者们恢复了在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导致地中海世界的货币化率大幅度下降。

巴纳吉试图论证韦伯的观点并不成立,他通过研究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学术观点。第一,考古资料表明,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货币化率要高于之前的任何时期。第二,当时存在着较为繁荣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济。这样的发展趋势源于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在行政体系和财政制度上的改革。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进行改革,吸收了大量行省精英,以此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新兴的精英阶层充分利用罗马帝国的税收体系,让国家用货币来支付他们的报酬,以方便他们更加快速地积累财富。

巴纳吉还试图通过这一时期埃及纸草中保存的大量私人商业契约来论证,古代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并非如此前学者们描述的那样衰退,而是充满了活力。他将这一时期的埃及描绘为一个农业经济繁荣的地区。新兴的精英阶层占有大量土地,雇佣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以货币支付劳动者的报酬。

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反对巴纳吉对韦伯理论的批评,但他得出的结论也引起了不少质疑。首先,埃及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具有特殊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罗马帝国东部的社会经济状况。其次,他没有讨论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大规模的瘟疫和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汤姆·布拉西,他认为巴纳吉试图论证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存在着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这等于走上了现代派的老路,回到了19世纪蒙森、迈耶等人对罗马经济的看法上。而蒙森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所批判的对象。巴纳吉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实际上并不自由,许多土地上的劳动者都被迫终身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此外,巴纳吉并没有详细论述当时埃及生产关系的变迁,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与巴纳吉相比,维克汉姆的论著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维克汉姆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关于地中海世界转型研究的代表作有《构建中世纪:400—800年的欧洲与地中海世界》,此后出版的《罗马帝国的遗产》则是对前一部著作的补充,将文化史的内容纳入其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视角的解释框架中。

维克汉姆的研究有两个出发点:其一,当今的古代晚期研究多偏重文化史,且集中于对社会上层的研究,缺少对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社会的中下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的情况关注不多。其二,对"罗马帝国衰亡抑或转型"的争论存疑。维克汉姆认为这一时期既有断裂又有连续,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发展特征。

维克汉姆将公元4到8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分为一些区域进行比较研究。他将意大利地区、高卢、伊比利亚和北非作为罗马帝国西部后续发展的研究案例,将埃及、叙利亚地区、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拜占庭帝国核心地区)作为拜占庭帝国统治下地中海东部地区后续发展的案例。此外,他还将当时的英格兰、威尔士和丹麦地区作为非罗马化地区在这一时期发展的案例。对于每一个地区,他都结合当时的文献和考古证据,从国家形态、贵族的权力结构、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交换体系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他指出,研究者仍然可以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总结出一些普遍的特征:比如,与此前的罗马帝国相比,中世纪早期国家在财政体系上普遍更为简化;贵族阶层(原先罗马帝国中的大土地所有者与蛮族统治者合作,形成西欧各国中的贵族阶层)更为衰落,经济实力大不如前,并且逐渐转型为军事贵族,强调尚武的风俗;农民的负担总体上减轻了,他们拥有较大的自由,甚至在部分地区完全摆脱了对贵族的依附;罗马统治的衰亡导致各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差异日益扩大;罗马帝国时期较为固化的社会等级制度消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了,而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曾经将整个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跨地区财政体系的崩溃。

农民问题是维克汉姆关注的重点。他认为这一时期地中海西部一度出现过一种"小农生产方式",其特征是农民在劳动生产中不依附于贵族,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劳动强度也较小。但由于当时物质文化条件的衰落和地中海世界跨地区交换体系的崩溃,大多数农民的劳动仅仅满足于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难以通过交换盈余的劳动产品来致富。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随着法兰克和意大利等地区贵族阶层力量的增长,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加重,各地陆续从小农经济转型为封建经济。

维克汉姆的两部著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尤其是《构建中世纪》一书,先后获得了2005年度英国的沃尔夫森历史奖、2006年度德国的"多伊彻纪念奖"和美国的"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奖"。

当然,研究者们也指出了其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他没有将巴尔干、亚美尼亚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地区纳入考察范围内,对宗教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缺乏充分论述。实际上,维克汉姆在《构建中世纪》的序言中已经有所提及。他表示,从社会经济史视角构建的地中海世界转型的解释框架无法涵盖这一时期的所有方面,再加上语言能力和研究专长的限制,他也不可能对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地区进行详尽的考察。

总体而言,这两位研究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考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下层农民的状况,为当今方兴未艾的古代晚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们的研究也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对地中海世界的转型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